

略论“一·二八”抗战期间 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

张 衡

淞沪抗战是以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国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爱国壮举。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存在着是抵抗、还是妥协这样两种方针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国民党内的分化加剧了,要求抵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妥协的,有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与代表亲日派的汪精卫;主张坚决抵抗的,不仅有国民党左派冯玉祥、李烈钧等。而且还有要求民主宪政的中间派。如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按照这场争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而且也加剧了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及派系斗争。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长的职务,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从形式上结束了南京、广州两个政府分治,蒋、汪、胡三个中央对立的尴尬局面。正如宋庆龄指出:“两方迫于国难民意,不得不暂停同室之戈,进行所谓和平统一。奔走会议,时逾三月,争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之疾苦利益,竟无一语之讨论,不知独裁之造成,党之堕落。确立国民经济之基础,舍此而言和平统一,纵使进行顺利,各如所愿,其结果亦不过和平分赃,统一作恶而已”^①。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引退浙江奉化老家,“日以读书写字为生活,报纸久不寓目,亦鲜谈及时事”^②;汪精卫称病住进上海医院,请求辞去中央党部常委和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之职,将一大堆内政外交难题推给孙科内阁处理。孙科曾抱怨道:“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点五万万元,但除还债项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元,欲再发公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以是影响外交军事种种问题”^③。其中对日外交成为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1932年1月上旬,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拟定了一份外交计划,其主旨为“消灭战祸,保护主权,并于最短期间务达收复失地之目的。”“关于收复失地方策:一、用外交方式将暴日最近侵华情形诉诸各国代表,用最有力行动以压制之;二、用消极的武力抵抗;三、唤起民众为外交后盾”^④。1月9日,孙科等人到上海慰问称病不出的汪精卫,企图寻求对其外交计划的支持,结果吃了闭门羹。在中央政治会议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孙科争取冯玉祥等人的支持,在中央政治会议名义下组织“特务委员会”,以应付困难及处置

各项政务。除汪、蒋、胡为当然委员外，孙科、陈铭枢、何应钦、于右任、陈友仁、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朱培德等九人为委员。这样两广势力在特务委员会中占了上风。1月14日，陈友仁在特务委员会上又提出了对日绝交的计划，并解释说：“对日绝交并非对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⑤。这一方案虽然未获即时通过，但是特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一般均认为不能再循柔弱，应取断然手段，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惜”^⑥。

孙科内阁的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他说：“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⑦。1月13日，蒋介石乘专机从奉化到达杭州，他在发表此行的目的时说：“余若不出，人将谓余不负责；余若出问国事，则必谓独裁复活。进退均无所逃于责备，故余只得以个人国民之地位，尽我对党对国之忠心而已”^⑧。“当此内忧外患，余力所能及，必当贯彻赞助当局之初衷，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地位，尽个人职责”^⑨。

在张继、何应钦等人的斡旋游说下，1月17日，汪精卫到杭州和蒋介石会晤，为了反对孙科内阁的对日抵抗政策，双方握手言和。声称“正虽束身引退，在谤毁丛集之中；铭虽大病未痊，亦深愿追随吾兄一同入京协助哲生等同志，以共支危局”^⑩。同时蒋介石召集汪精卫、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等举行了会谈，其目的是蒋、汪向孙科施加压力，迫使他改变对日政策。蒋介石在发言中露骨地说：“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罔必灭亡。故余不顾一切入京，以助林森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可尽天职而已”^⑪。这一番谈话是蒋急于复出的要害所在。

蒋、汪出山仍然是重弹“先行安内，方可攘外”的老调。在蒋、汪等人主持的中央委员谈话会上，对陈友仁的对日绝交计划，称之为“高调”、“徒博民众之彩声，而于国难毫无裨益，且定以使时局不能善后”^⑫，要求立即免去陈友仁外交部长的职务。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〇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特务委员会，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委，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委。这样，力主对日强硬方针的两广派被排挤出外交委员会。1月28日，汪精卫上台组阁，孙科改任立法院长，陈友仁被迫辞职，由罗文干接任外交部长。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孙科内阁终于在汪精卫、蒋介石的夹攻下倒台，其所拟定的对日绝交计划尚未出台即遭受夭折。

二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汪精卫出于形势所迫，玩弄两面派手法，曾在公开场合下说些漂亮话。例如，1月25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答复各报记者提问时说：“对日问题……无论如何困难，决以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为原则。”“如日方竟实施强暴行动，我国当局应抱最大决心，与之周旋。总之，衅自彼开，隐忍当有止境”^⑬。同时，他们却顽固推行妥协退让的方针，竭力阻挠破坏上海军民的抗日救亡活动。1月27日，上海市长

吴铁城秉承蒋、汪旨意，以“组织既未遵法定程序，举动又时逾常轨”为由，取消了上海各界抗日会。同日，蒋介石、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会常委的名义，会同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发了一道电令给宪兵司令谷正伦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⑭。谁知电令下达的第二天，宪兵第六团刚到达上海还未及换防，日本侵略军已迫不及待地挑起战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蒋介石慌忙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汪精卫等人在1月30日发表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中表白道：“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自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绝强邻之藉口”^⑮。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发表演讲，对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进行辩解：“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但这只是一种借口罢了。

三

第十九路军坚决抵抗的正义之举，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在国民党内也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国民党各地军政要人纷纷发表通电，积极响应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要求当局调集各路援军协助第十九路军抗日自卫。其声势之大，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规模。

在各地的声援通电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孙科、李宗仁等11名留沪中委即联名致电汪、蒋：“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迭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十九路军军实饷糈”^⑯。孙科等人还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揭露“政府向持消极无抵抗政策，竟犹低首下心，完全承认其要求，以为如此柔顺，即可免祸。岂知日人野心，得寸进尺，久成惯技，我愈示弱，彼愈强横，我愈退缩，彼愈进迫，无抵抗之结果，必召亡国之痛”^⑰。号召“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惟赖吾国全体国民，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与敌周旋，庶能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否则坐而待亡，国家民族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同人等心所谓危，又难缄默，除电请政府及京沪附近军队火速应援外，并恳我全国民众军士，一致猛醒，准备抵抗，同赴国难，是所企祈”^⑱。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委胡汉民致电十九路军将士：“沪案屈服，四百万民众遭受摧残，闻之雪涕。今战事发生、群情益愤。兄等持正不屈，力抗暴日，为民干城，感慰无极。亟盼益励士气，歼彼凶残。军人报国，此盖其时，传檄天下，天下当争起以应”^⑲。

1月31日，国民党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至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忱”^⑳。同日汇款40万元接济十九路军。

此外,国民党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军何健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黄埔军校革命同志会以及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等均发表通电,坚决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积极请命上前线抗日。甚至在“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将领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鄂豫陕边区清乡区督办徐源泉于2月1日通电说:“源泉分属军人,身早许国,雪耻复仇,尤为夙愿。刻为国族挽危亡,为华胄争人格,已淬砺所部、听夕申警,枕戈待命,誓死为国”^②。在南昌的30多名“剿赤”将领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秉宁为玉碎之旨,凛匹夫有责之怀,一致御侮,百死不辞”^③。空军将领也通电全国:“东北事变,数月于兹,三省之失地未收,淞沪之惨暴继演,公理沦胥,举世愤慨。我空军系国民属望之殷,将士报敌忾同仇之切,为国死难,夙具决心,磨砺枕戈。匪伊朝夕。只以政府负重,冀望和平,以致忍辱迁延,求死不得。兹者领空领土,横被摧残,寇焰益张,国亡无日。秉衡等防空有责,誓抗强梁,妥用集结,以图自卫,海枯石烂,此志不渝,凡我国人,幸垂鉴察”^④。

四

在举国一致的抵抗声中,抗战图存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蒋介石当然不敢再公开地反对抵抗了。1月3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之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励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⑤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已一改妥协退让的方针,决心誓死抵抗了。但蒋真正用意是要三军将士“勿作虚浮之豪气”、“枕戈待命”,以便伺机与日妥协。

“一·二八”抗战刚开始不久,何应钦即以“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⑥为借口,下令十九路军“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⑦。“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亦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而图捣乱”^⑧。何应钦致电蔡廷锴,规定十九路军航空队“除对日机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⑨。在蒋、汪旨意下,何应钦密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设法转圜停战”^⑩。何应钦在2月8日致吴铁城并转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等人的电报中说:“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分原气也。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须依据各国通牒第五条,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纾缓迁延,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请兄等商在沪诸中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⑪。

蒋、汪、何一面向上海党政要员及十九路军施加压力外，一面派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为代表，前往上海与日方密谈。2月8日，王俊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吴淞为双方之战略上必争之地，闸北为双方攻略上所必夺之区，日方以援兵陆续可到，必夺得吴淞、闸北后交涉方占有优势之地步。我方处不攻不退之际，徒延时日，锐气一消，补救益难。目下全国积极作战既不可能，宜速乘此小战小利之机，图收亡羊补牢之效。万一吴淞、闸北俱失，始仓促而求人，则损失巨矣。此事关系至大，……俊拟设法单独进行，以期无空此行也”^{②0}。10日，王俊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称：“本日会田代少将畅谈三小时，田代对双方撤退及我国派警察维持中间地区治安之问题，无甚反对意，但恐实行困难，盖虑我便衣队暗中扰害之故。又，日在沪陆海军互闹意见，结果胜利必归陆军，我应以陆军为对手，进行自多容易”^{②1}。何应钦即与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外交部长罗文干共同拟定了以下办法：“双方自动撤退，即：日军撤至租界内，我军撤至相当地区。两军撤退之中间设一和平区，由双方共同请中立国酌派小队暂时驻扎，所有和平区域内之行政、警察、仍由中国照常办理。盖日方以双方撤兵不能避免中国便衣队扰害为虑，则最好有第三国居间，可以免此顾虑，日系双方自动请第三国居间，与受第三国干扰不同，故无失体面”^{②2}。何应钦一面将上述所定办法电告吴铁城、蔡廷锴、王俊等人，要他们遵照所定办法，“迅与日方切实商洽”，一面将部署情况电告蒋介石，“并乞裁示”。

蒋、汪、何之流的妥协活动泄露之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其中，国民党在沪中央委员于2月13日发表《请政府当局速定大计》的通电：“比闻军事外交当局，有主张沪事局部化，先行解决之意，英使复有我国自动撤兵之劝，而当局认为可商。同人在沪，迭加研讨，心所谓危，敢陈所见。溯自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误于不抵抗之谬论，使日寇唾手遂得三省，而军事当局亦慑于日兵声威，辄谓纵倾全国之兵，不足抗日，我与日战，三日可以亡国，同人以为此种心理，不特与总理遗教主义，完全违悖，充其弊，实足以亡党亡国而有余，非彻底扫除，决不足以冲破今日之危局也”^{②3}。

“今国民愤日与救国之热情，已达极点，对主张不抵抗者，嫉之尤甚。观于此次沪民之被难而无怨，与其输将助战之勇，即沪上素称持重之报纸，亦咸为激昂之论，即可观真正民意。苟当局犹牢执其妥协屈服之主张，或竟实行撤兵，使日军占沪，长驱而攫取苏杭与首都，将何以维民众之信仰，遏军士之忠愤？同人等亦不愿与今日当局同负此责也”^{②4}。

“请政府当局迅速定计者：（一）决定彻底抵抗政策，毋再游移，即宣示国人，全力御侮；（二）萃海陆空军力量，固守上海，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三）即令北方各军乘机向关外反攻，收复失地；（四）外交方面，提出非日兵全部撤退不即交涉，上海问题，当于东三省问题，同时解决”^{②5}。

留沪中委的通电，不仅公开批评了“三日可以亡国”的谬论，尖锐地指出妥协屈服必将丧失士气民心的危险，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条大政方针，强烈要求政府“毋在游移”、“全力御侮”。这无疑是对蒋、汪之流妥协活动的愤怒抗议。党国元老吴稚晖也写信指责何应钦：“适可而止，人同此心。……但日人之暴横，说不到我等良心，能忍与否？似乎竟使我等虽欲忍受而不可得。上海突焚三友社开衅，封闭民国报，解散抗日会，要求四条件，唯命是听。下午已满意，晚间即开炮。其为词则欲远撤华军。假令当日十九路军不抵抗，立即远撤，必实际占领闸北，为进一步之要求。其增兵而不肯退兵，必与东三省之作为无以异……故弟于卅电告蒋、汪两先生，已力破我等欲保留原气及实力之迷梦……弟非荒谬者，情势

已如此，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许我。大难已到，愿贡其狂愚，望先生切商于蒋、汪诸先生，似不能再以习常蹈故之心理对付也”^{③7}。何应钦为自己辩解，并推卸责任：“旬余以来，党国诸公，仍散居各处，迄未共筹对策，分任艰难，竟将种种重责，粹集钦之一身，长此以往，宁免陨越？钦纵不遑，自惜其为国家前途何？言之不禁泣下”^{③8}。为了欺骗舆论，汪精卫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③9}。“我们本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野不唱高调，在朝不说软话，以沉着的精神，与日本作长期的奋斗”^{④0}！在此种局面下，蒋介石很清楚，此刻如不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战，必将严重地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军事领导权。因此，他同意京杭两地驻军的请战要求，但拖延批准发兵的时间。对于各方请援，均以“运输困难”，“既无名义，可以抽调军队，亦无权责，可以指挥军事”为藉口而搁置。2月25日，蒋介石电告十九路军“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援队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④1}。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2月27日，刚刚赶到上海的国民党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除派两个营在黄渡筑工事外，两个团被蒋介石西调守镇江，一个团西调守南京。戴岳的独立旅虽然已抵达杭州，可是，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敢调其部赴沪参战。因此，说穿了，蒋介石为了搞政治投机，以此搪塞国内党内的不满和诘难，同时为自己复出造舆论，迫不得已派第五军参战，而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屡次挫败日军的猛烈攻势，这的确使蒋介石捞到不少政治资本。3月2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后撤。4天以后，蒋介石却在国民党的四届二中全会期间重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16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五

淞沪抗战虽然失败，国民党内的战与和之争并未就此完结。在不久后召开的国难会议上，抵抗和妥协的分歧斗争再次激烈展开。

1932年4月，国难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此外，国难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这对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停战谈判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国难会议还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御侮是假，剿共是真。在宣言发布之后，国难会议接连通过一系列有关“绥靖”的议案。例如《为利绥靖进行，请厉行自治并改造自治办法，以弭灾难而固国本案》、《剿共恢复县市，应即实行平均地权制度，以期早日肃清共祸案》、《改良军政以利剿匪御侮案》、《实行军民分治、发扬司法精神，以立绥靖基本案》、《采用思想导善方策，根本救正人心，积极消灭共匪案》、《弥共计划急应改善，改剿为抚，藉可以德服人而节省兵力案》、《请政府责成全国各县限期编练保卫团，实行保甲法，以消匪患而助国防案》等等，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停战协定》。不久，蒋介石在庐山剿共会议上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才是蒋介石当时真正的“国策”。

（责任编辑 王晓华）

- ① 《申报》1931年12月20日,《宋庆龄宣言》。
- ② 《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四版《蒋移住深山中》。
- ③ 《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九版《孙科返京前谈话》。
- ④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⑤ 《申报》1932年1月17日,第八版《陈友仁所拟外交方案要点》。
- ⑥ 《申报》1932年1月16日,第四版《迭经磋商中之对日外交方针》。
- ⑦ 李敖:《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77页、第18页;台湾华文出版社。
- ⑧⑨ 《申报》1932年1月15日,第九版《蒋介石在杭州表谈话》。
- ⑩⑪⑫⑬ 《申报》1932年1月18日,第三版《蒋汪会晤结果》、1月25日第三版《外长有更迭说》、1月26日第四版《各中委在励志社谈话》。
- ⑭⑮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⑯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6辑。
- ⑰⑱ 《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二版《孙科等致各团体电》。
- ⑲⑳㉑㉒㉓ 《申报》1932年2月1日,第五版、2月4日第三版、2月5日第四版、2月6日第一版。
- 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㉜㉝㉞ 《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2月15日。
- ㉟ 李敖:《蒋介石研究》第三集,《吴稚晖先生墨迹》第九篇,台湾华文出版社。
- ㊱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㊲㊳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6辑。
- ㊴ 李敖:《蒋介石研究》第三集第81页,台湾华文出版社。

封面档案介绍

本刊1991年第四期封面档案为孙中山复蔡元培函,内容为:“子民先生大鉴:来示敬悉。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则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专此即颂

道安并复

孙文谨覆 十二日

此件时间为1912年1月12日,信中“康氏”指康有为。从信中可了解孙中山关于临时政府人选的原则。

封面照片人物后排左起:胡汉民、张继、邹鲁、陈铭枢、陈友仁、孙科;前排左起:伍朝枢、汪兆铭、蔡元培、张人杰。